

# 从土生华人到老归侨(上)

## 萧群

我是印度尼西亚著名华人社会政治活动家萧玉灿的长女,父母都是在荷兰人办的学校上的学。

我爷爷已经是第二代移民,也就是土生华人,做小生意。我奶奶虽然是出生在印尼,却是在新客华人的环境里长大的。家里跟她讲客家话,还送她到中华会馆去读书,这样,她普通话也讲得不错。我爸爸的姥爷要他学中文,好继承生意。而我爷爷则希望他的儿子接受荷兰教育,认为上荷兰学校对孩子的前程更有利。爷爷趁姥爷姥姥回中国之机,把我爸爸送进了荷兰人办的学校。因为家里变故,爸爸的双亲早逝,18岁的他只能求助于家庭并不富裕的朋友们。他们劝他变卖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,以此为资本去经营出租汽车业。他还去当武术教练,同时刻苦学习,完成高等市民学校的学业。这样,他才得以维持生活并支付他弟弟的学费。当时,他弟弟刚14岁,在荷兰初级中学上三年级。他很早走向社会,认识了当时华人社会的领袖林群贤。他受到孙中山先生“三民主义”的影响,积极参加青年活动和社团活动,为其走政治道路奠定了基础。

后来,爸爸从泗水搬到三宝垄主持《太阳报》,这期间在批年轻人宿舍里认识了我妈妈陈银花。她也是侨三代的女儿。我爸爸妈妈婚后不久,我妈妈的双亲几乎同时去世,他们俩随即承担起抚养我妈妈的4个从2岁到14岁的弟弟妹妹的责任。我的小姨才比我大3岁。而这一切都是爸爸一人承担。幸运的是,爸爸作为《太阳报》的领导,收入还算比较高。当然还有周围朋友的关心帮忙,我叔叔、叔母的努力。因此,虽然生活简朴,还能满足突然增长的家庭需要。叔叔叔母做小生意,从1941到1947年便和我们在一起生活。日本人侵印尼时期,我们两家大小一起逃难。经常是爸爸不在家,靠叔叔和爸爸战友带我们家逃难。

1947年初爸爸工作变动,我们家从玛琅搬到日惹,当时爸爸已经在印尼政府部门工作。只有妈妈带着我们四、五个小孩,包括她自己的弟弟妹妹。爸爸的同事经常来家帮忙,问长问短。为了上学,舅舅骑自行车带我,出了车祸使我头破血流,至今伤痕还在。

1950年又因爸爸工作变动全家搬到雅加达。最初住在大南

门《人民日报》报社楼上,后来才搬到门腾(Menteng)市区,租了一个国会议员的房子一直住到苏哈托上台后,让我们搬家到玉融公会的二层居住。

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,爸爸经常不在家,一早就起来打字为报社写稿,晚上经常开会,很晚回家。我们5个兄妹上学就由报社司机接送。

我们在家讲印尼话,妈妈爸爸之间偶尔讲荷兰语,我们5个小孩只在学校学中文,讲普通话。我的活动范围是家和学校两点一线。只有很短时间曾经在中国银行印尼分行的行长高先生家学过钢琴。我跟他的4个孩子也较熟悉。

我爸爸强烈主张,几百万印尼华侨华人安居乐业的出路,是融入当地社会,把印尼当成自己的祖国,建设印尼殊途同归的多元化社会;同时他也对祖籍国怀有感情,强烈呼吁华侨华人要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。他的孩子读书都是在进步中文学校(如雅加达的振强小学、新华小学、巴城中学等),我所接触的同学、老师都是热爱新中国的。所以我上初中时就有回国念书,建设社会主义的想法。1956年我初中毕业要求回国,因在中国没

亲戚,年龄又太小,父母没让我去。刚好那年印尼国会代表团到中国访问,我爸爸也是成员之一。访华期间他亲自了解了中国的发展和学校情况。当1957我再次提出回国时,爸爸同意了,他卖掉了家里的汽车,给我留作在国内的生活费。

从1957年到1960年,我在北京女三中读高中。每月的生活费是10元,其中8元是学校的伙食费,2元是零花钱。这三年花的就是爸爸卖汽车的钱。1960年到1965年在天津大学学习。这时,我的生活费是25元助学金。除了吃饭,手头宽裕多了。8年来我虽然拿的是印尼护照,算是“外籍华人”,但我和中国学生同吃,同住,同劳动,同学习,和学校其他华侨学生也没来往。学校

组织上山下乡,住老家,下地干活,吃野菜。困难时期限粮食,吃米饭加糖,吃水发的窝窝头,营养不良导致肝大,浮肿,我都和国内同学没有两样。再困难,我没有退缩,没有抱怨;相反,谁说中国不好,说共产党不好,我就会反对,容不得别人说毛主席周总理半句坏话。日子好的时候,馒头抹芝麻酱加糖是我最爱,几分钱冰棍是我的零食。到周末,我的监护人施碧青阿姨,准给我准备一桌饭菜,她拿我当她大女儿,给我母爱,无微不至地照顾我。学校同学对我也很好,像亲姐妹一样。回国初期,我还向爸爸说我们快实现吃饭不要钱,共产主义就在眼前;我要向中国学生一样入团入党。当时我根本不懂我的国籍问题会



雅加达周恩来图片展参展人员拜访中国大使馆,前排右三为作者,右五为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,右六为对外友协副会长林怡,左四为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建

雅加达周恩来图片展部分参展人员参观印尼客家博物馆